

中西方儿童成长叙事比较与教育转化

——以《草房子》《汤姆索亚历险记》为例

项青菁^{1*}, 胡思言¹, 何 润²

¹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²树德中学,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 要

中西儿童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的差异, 折射出文学传统与成长观念的不同。《草房子》采用多视角并置, 在沉静抒情的笔调中, 将苦难化为生命底色, 成长意味着向内承担与责任担当; 《汤姆·索亚历险记》则以单一儿童视角贯穿, 在狂欢式的历险中, 出走与归来成为自我确证的仪式, 成长指向向外探索与个体自由。然而, 当前语文教学多停留于情节复述, 难以将叙事差异转化为有深度的教学内容。本文将从叙事语言、视角、主题三个维度切入, 探索两种模式的互补整合, 为跨文化阅读教学提供参照。

关键词

成长小说, 叙事比较, 教育转化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dren's Growth Narratives and Thei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aking *The Straw House* and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as Examples

Qingjing Xiang^{1*}, Siyan Hu¹, Run He²

¹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²Shude High School,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7,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项青菁, 胡思言, 何润. 中西方儿童成长叙事比较与教育转化[J]. 教育进展, 2026, 16(8): 738-744.
DOI: 10.12677/ae.2026.1681687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in narrative patter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dren's coming-of-age novels reflect distinct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concepts of growth. *The Straw House* employs a multi-perspective juxtaposition and, with a calm and lyrical tone, turns suffering into the very fabric of life, where growing up signifies inner commitment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contrast,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adopts a single child's perspective throughout, and through a carnivalesque adventure, departure and return become rituals of self-affirmation, with growth oriented toward outward exploration and individual freedom. However,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often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plot retelling, making it difficult to transform these narrative differences into meaningful teaching cont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lementary integration of the two models from three dimensions—narrative perspective, style, and theme—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ross-cultural reading instruction.

Keywords

Coming-of-Age Novel, Narrative Compariso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成长是儿童文学最恒久的母题，中西方儿童成长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分野，这种差异映照着不同文化对成长的理解。当然本文将《草房子》与《汤姆·索亚历险记》并置，并非因为二者完全代表了中国与西方儿童文学的全部面貌。任何成熟的文学传统都有着丰富的异质性。中国儿童文学中不乏张扬探索精神的作品——郑渊洁笔下皮皮鲁的叛逆出走，“向外探索”也是不可忽视的叙事脉络；西方儿童文学中也存在强调伦理关系的作品——《夏洛的网》中威尔伯在友谊中获得救赎，“关系性成长”同样是西方儿童文学的重要一环。因此，《草房子》与《汤姆·索亚历险记》两部作品各自以高度成熟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两种叙事传统中具有典型性但非唯一性的成长模式。认识到这一点，比较才不至于沦为标签化的对立，而能真正进入叙事形式与成长观念互构的深层地带。

当前研究中，围绕《草房子》的单部作品研究，学界已从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在叙事风格层面，尹静指出曹文轩“致力于在残缺、孤独、死亡等苦难中彰显悲剧主人公们不惧不畏的风度，从而以‘攫人心’的力量唤醒沉睡在读者心里的生命韧性与张力”[1]；王晓娱从叙事模式角度切入，认为《草房子》中的少年们“在成长道路上接受考验，缺失的召唤与层层考验都给主人公们带来了难以回避的痛苦与困难，但他们于逆境中探索自我，磨砺意志，最后携智慧归来”[2]。在教育价值层面，研究者关注《草房子》的儿童心理书写与教育思想。围绕《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单部作品研究同样积累丰厚，有学者从创作时间、内容、主题和人物等方面对马克·吐温的儿童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叙事学与语文教学的交叉领域，叙事学理论已被逐渐引入阅读教学实践。申丹的叙事视角理论[3]已应用于高中语文小说教学研究。然而，叙事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多停留于单篇文本的分析，鲜有将跨文化叙事比较与教学转化相结合的探索。并且，目前的语文教学常陷入将中西叙事差异贴上简单标签的困境，未能引导学生探入叙事深处的成长价值。鉴于此，以下从叙事语言、叙事视角、叙事主题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比较，并据此设

计可操作的教育转化路径。

2. 叙事之维：叙事语言、叙事视角与叙事主题比较

2.1. 叙事语言：沉静抒情与狂欢历险

《草房子》的底色是苦难，但曹文轩用富有诗意的抒情笔调将其包裹，使苦难不再是需要被战胜的敌人，而成为可以与之共处的生命底色。药寮里，“桑桑最喜欢看温幼菊煎药。那只红泥小炉，炭火总是不紧不慢地燃着。温幼菊坐在炉前，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轻轻地扇着。药气便漫开来，像早晨的雾，飘飘缈缈地，将整个药寮都罩在了里面。桑桑觉得，温老师的药寮，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最温暖的地方。”这里没有病痛的嘶喊，只有舒缓的炭火、轻轻扇动的蒲扇、如晨雾般弥漫的药气。叙述者用一连串温润的意象，将“病”转化为一种近乎美的存在，完成对苦难的定性。秦大奶奶的去世同样体现了这种克制而诗意的笔调，“秦大奶奶静静地躺在艾地里。艾草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动，像是在替她说着什么。”叙述者不说“悲痛”，只让艾草叶子“轻轻摇动”，让苦难在沉默中完成它的教育。

《汤姆·索亚历险记》则采用幽默、动感的狂欢风格。马克·吐温的笔调有着口语化的亲和力与反讽的机智。以杰克逊岛的“海盗”章节为例，“他们三个脱得光溜溜的，在浅滩上追逐着、嬉闹着，把水花溅得老高。他们学海盗说话，用最凶残的语气相互威胁，然后笑成一团。”连续的短句和动作描写，释放了被成人社会压抑的生命力，尽显狂欢笔调，让读者暂时忘却社会的规训，沉浸在儿童自治的乌托邦中。汤姆刷篱笆的经典段落更体现了马克·吐温的反讽艺术，“汤姆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一条伟大的定律：要想叫一个人渴望得到某样东西，只需要让那东西难以到手就行了。”在这里，叙述者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讲述汤姆如何把苦役变成特权，让读者在笑声中看到儿童对成人规则的颠覆。

可《草房子》并非一味沉静。在杜小康的暴风雨夜，曹文轩大篇幅铺陈自然环境的严酷，“风越来越大，芦苇被吹得几乎贴在了水面上。雨点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水面，激起密密麻麻的水花。”这种铺陈将苦难外化，节奏骤然加快，但在风暴过后，却只用极短的句子收束：“杜小康望着父亲，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酸楚，但随即又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能替父亲分担些什么了。”成长的重量在之前的承受中已经全部积攒，这里只需轻轻一点。当然《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狂欢也并非毫无节制。当汤姆偷偷回家听到波莉姨妈哭泣时，戏谑被收住，幽默给温情让路，“汤姆钻进厨房，躲在桌子底下。他听见波莉姨妈在哭，听见她在说：‘可怜的汤姆，我再也不打他了。’”叙述者不再调侃，而是让读者直接听见一个失去孩子的姨妈的忏悔。山洞历险中，“洞中一片漆黑，只能听见远处什么地方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那声音空空的，显得格外的寂静，寂静得有点吓人。”冷峻的笔锋、放慢的节奏、空旷的寂静，与之前的狂欢形成强烈反差。两种风格并非天然隔绝，它们在各自的关键时刻都向对方的领域迈出了一步，这使得差异更加耐人寻味。

2.2. 叙事视角：视角交织与有限全知

《草房子》的核心叙事特征是多视角叙事，每个儿童都拥有相对完整的叙事空间。以“秃鹤”为例，叙述者直接进入秃鹤被嘲笑后的内心世界，“秃鹤坐在石头上，低着头。从梧桐树叶间漏下的一缕阳光，照在他的秃头上，光溜溜的，像一面镜子。”这段描写中不仅呈现了秃鹤的外貌，也隐喻了他内心的敏感之处。在这里，秃鹤拥有完整的叙事空间，让读者直面他的羞耻与倔强。在杜小康家道中落后，“杜小康坐在家里的门槛上，呆呆地望着门外。门外，是一条路。这条路，通往学校……杜小康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只是觉得，心很空，很空。”叙述者把叙事空间交还给了杜小康，“心很空，很空”来自杜小康自己的内在感受。在暴风雨夜的芦苇荡中，风暴暂歇的那一刻，“杜小康望着父亲，觉得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酸楚，但随即又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能替父亲分担些什么了。”

这段独白更是完整呈现了杜小康成长的瞬间——酸楚与长大的感觉同时涌现，完成了杜小康的人物弧线。

而《汤姆·索亚历险记》以汤姆为单一焦点，尽力贴近汤姆的感官与情绪，其他人的内心读者难以感知。比如，墓地目睹凶杀时，“汤姆吓得魂不附体，浑身直哆嗦。他看到那个叫印第安·乔的人，举起刀，猛地个犹豫了向那个年轻人刺去。”读者能通过汤姆的颤抖感受现场的恐怖，但我们无从得知哈克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再如汤姆“死后复活”一节，“汤姆躲在教堂的二楼，透过地板上的裂缝往下看。他看见波莉姨妈在哭，看见同学们都低着头。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有点得意，又有点难过。”整个葬礼场景以汤姆的单一视角完成描述，波莉姨妈有多悲伤、同学们在想什么，读者无从得知。即便是作为冒险团的哈克，叙述者也要通过汤姆的视角来呈现，“汤姆看见哈克贝利·费恩穿着那件永远不合身的破衣服，在街上闲逛。汤姆心里想：哈克真是自由自在，什么规矩都不用管。”在这里“哈克真是自由自在”是汤姆的感知，不是哈克自己的感受。哈克的存在更像是汤姆眼中的镜像，而非独立的心灵主体。

《草房子》的多视角叙事构成了对“人伦网络”的文学诠释。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如同水面上推开的波纹，以‘己’为中心，依亲疏远近形成有差等的次序”^[4]个体并非孤立原子，无数“己”的波纹彼此交错重叠，构成复杂的人伦网络。《草房子》让桑桑、秃鹤、杜小康等角色轮流成为叙事焦点，拥有独立的内心世界与叙事空间。这种结构意味着，没有一个自我是绝对的中心，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人缠绕共生。“差序格局”中的“己”具有伸缩性，在父母面前是儿子，在子女面前是父亲，这种“情境性自我”深刻影响了《草房子》对成长的处理——桑桑被确诊绝症时“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杜小康在暴风雨夜扩展为“家庭支柱”。叙述者之所以进入每个角色的内心，正是因为成长的意义恰恰在于个体如何重新感知自己在“波纹”中的位置。《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单一叙事则呼应了人类学家特纳所言的“阈限”理论^[5]。特纳指出，成年礼往往需要在“阈限”中完成——一个既非旧身份、也非新身份的过渡地带。墓地、杰克逊岛、山洞，都是汤姆经历的阈限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他独自面对恐惧、做出道德抉择、完成生命的考验，这种叙事选择背后，是一种将成长理解为个体的自我完成。由此可见，叙事视角的差异可以塑造两种不同的成长观。

2.3. 叙事主题：承受与出走

《草房子》中，桑桑、杜小康、秃鹤都是在被动降临的苦难中完成成长。桑桑被诊断为绝症时，“桑桑没有哭。他想，他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不再让爸爸妈妈操心。”“懂事”意味着接受命运。当父亲桑乔背着他四处求医时，“桑桑趴在父亲的背上，觉得父亲的背很宽、很稳。他想，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这一刻桑桑的成长是在苦难中，发现早已存在却被日常遮蔽的社会关系——父爱的厚重、家庭的支撑。杜小康家道中落后，“分担”成为他成长的关键词。“杜小康望着父亲，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酸楚，但随即又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能替父亲分担些什么了。”它表明成长不是摆脱关系去获得自由，而是在关系中主动承担责任。桑桑、杜小康、秃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与伦理关系的破损与修复相伴。

而《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成长恰恰相反，其每一次重要的成长都是因为主动的出走。墓地之行并非意外，而是汤姆主动选择的迷信仪式，“汤姆和哈克约好了半夜带着死猫去墓地，为的是治疣子。”而杰克逊岛是三个男孩主动宣布脱离成人世界，“他们三个站在岛上，望着对岸的小镇，觉得自己是最自由、最了不起的人。”汤姆的成长，不是被动承受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的主动选择来证明自己的过程。他选择说出真相指认凶手，选择在法庭上作证，选择在洞中探索生路。每一次选择都让他更接近一个独立的、有道德判断力的主体。

更具对比意义的是两部小说的结尾。《草房子》的结尾，桑桑在父亲背上离开油麻地，“桑桑趴在父亲的背上，回过头去，望着那片金黄色的草房子，望了很久。”桑桑一改跳脱的性格，只是在离去时

刻，长久地凝视那片承载了所有人命运的草房子。这一凝视意味着他学会了承受，学会了理解，学会了让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重量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所言，个体“不是一根根独立的柴火”，桑桑的成长是在油麻地的伦理波纹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个结点。《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尾声则具有另一种深意。汤姆拿到宝藏之后，并没有安顿下来，小说的结尾暗示他将继续保有出走的勇气。成长的终点不是抵达一个安稳的位置，而是获得不断出发的勇气。汤姆在离开中体验自由，每一次出走都让他带着新的荣誉回归小镇，从而改变小镇对他的定义。从“顽童”到“英雄”的身份转换，不是通过规训完成的，而是通过出走实现的。两种主题并非价值对立，而是人类理解成长的两种不同思维。成长可以是内敛的，也可以是外拓的。但对教育而言，这两种资源都不可或缺。

3. 转化之径：叙事维度差异下的教学内容建构

从文学角度看，《草房子》与《汤姆·索亚历险记》分别代表了中西方儿童成长叙事的典型范式，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将这两种叙事差异转化为有效的教学内容。可目前的教学实践常常止步于情节复述和人物概括，学生难以真正体会到叙事深处的成长意义。基于此，本部分设计了递进式的教学任务，以达到“通过对读推进文化理解，通过改写培育迁移创造”的目的，逐步引导学生探入叙事深处的成长价值。

3.1. 思辨建构：对读中的文化反思

对读是引导学生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关键环节。教师先聚焦叙事语言，呈现两组核心片段供学生对照精读：一组为《草房子》中药寮描写，“那只红泥小炉，炭火总是不紧不慢地燃着……药气便漫开来，像早晨的雾”，另一组为《汤姆·索亚历险记》杰克逊岛狂欢段落，“他们三个脱得光溜溜的，在浅滩上追逐着、嬉闹着……”。学生从节奏、修辞、情感基调三个角度逐句批注，完成语言风格观察表，再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分享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语言风格并非偶然，而是作家对成长本质的不同理解——《草房子》视苦难为需要接纳的生命底色，故以抒情笔调抚平痛感；《汤姆·索亚历险记》视成长为挣脱规训的自由宣言，故以狂欢笔调释放生命能量。

在语言辨识的基础上，教师继而将焦点转向叙事视角，出示“叙事视角图谱”表格，要求学生分别梳理两部作品在关键场景中的叙述焦点。通过梳理《草房子》中“秃鹤被嘲笑”“杜小康家道中落”“桑桑生病”等情节，学生发现每个角色都拥有完整的心理呈现空间，视角交错；而梳理《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山洞迷路”等场景时，学生则察觉读者始终经由汤姆的眼睛观察外部世界，视角聚焦于单一主体。完成图谱后，教师抛出假设性问题，如果《草房子》改为只从桑桑的视角写，会失去什么？如果《汤姆·索亚历险记》增加多视角内心独白，又会改变什么？让学生在思考中意识到，视角不仅是技术，更是价值立场的体现。

最后，教师将讨论引向最深层的主题维度，让学生经过充分讨论，能够凝练出《草房子》的关键词为“承受”；《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关键词为“出走”。教师将两个动词并列板书后，抛出两个结构化的辩论问题——“如果你是桑桑，在经历了纸月离去、秦大奶奶去世、自己大病之后，你会选择留在油麻地，还是像汤姆一样离开去寻找新世界？”“如果你是汤姆，在找到宝藏之后，你愿意被道格拉斯寡妇收养、回归正常生活，还是继续和哈克去探险？”要求学生必须从文本中寻找依据来支撑自己的立场。辩论结束后，教师进一步引导文化反思：为什么“承受”在中国文学中如此动人？为什么“出走”成为美国儿童文学的经典模式？让学生在倾听与辨析中明白，两种成长各有其文化土壤，没有优劣之分。最终，教师鼓励学生在自己的成长叙事中，既懂得在困境中“承受”以滋养生命的厚度，也不失“出走”的勇气去探索未知的可能。

3.2. 迁移创造：比较中的改写训练

完成系统对读之后，学生已从语言、视角、主题三个维度建立起比较认知，此时进入改写训练环节，通过“做中学”将理解转化为能力。改写训练分两步推进，由浅入深。第一项为视角改写，要求学生从哈克的视角重写《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墓地探险”场景。学生需在改写中展现新视角下的心理活动与细节观察，完成后组织对比朗读并讨论：“当你从哈克的角度写时，故事的重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哈克看到了哪些汤姆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有学生在改写中发现，哈克更关注印第安·乔的靴子与地面摩擦的声音，而汤姆更关注刀光的闪动，这提示了不同性格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聚焦。通过视角改写，学生亲身体验到“谁在看”决定了“看到什么”，进而理解视角差异如何塑造不同的成长意义。

第二项则聚焦语言风格的迁移创造。教师要求学生完成两项仿写：一是将《草房子》的药寮片段改为汤姆式的狂欢笔调，二是将《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杰克逊岛狂欢改为《草房子》式的沉静抒情。仿写完成后，组织“原作与改写品读会”，让学生体会自己改写之后的作品失掉了原作的什么。使学生体会到将药寮改为狂欢笔调后，虽然增添了趣味，却丢失了苦难被诗意包裹的沉静力量；而将杰克逊岛改为沉静抒情后，虽然意境优美，却再也感受不到挣脱成人规训的生命释放。教师顺势总结，语言风格不是装饰，风格本身就在言说一种对成长的态度。通过这种“失去”的遗憾，学生从无意识的阅读感受上升为有意识的风格辨析，实现了从“读故事”到“读语言”的审美进阶。最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自身写作，在记叙成长经历时，可以根据想要表达的情感基调选择不同的叙事语言，从而将比较阅读的收获迁移为真实的表达力。

3.3. 审视反思：教学实施中的挑战与对策

上述教学设计在实际课堂中可能面临多重挑战，以下将讨论具体的实施挑战与相应对策。首先，对读对学生的文本细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要求较高，在基础较弱的班级中，学生可能难以独立完成多维度批注，也可能因语言积累不足而效果不佳。对此，教师可采用“脚手架”策略分层，在语言风格分析环节，可先提供填空式的观察表，预设批注角度，如引导学生关注“这段文字中动词多还是形容词多”“句子是长是短”等具体问题，降低自主发现的难度，并通过小组合作弥合个体差异，让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协作中互相带动。更为关键的是，价值立场环节若把控不当，学生可能将“承受”等同于“被动保守”、将“出走”等同于“进步自由”。为此，教师需在讨论中持续引入“反例”与“复杂性”，并明确强调两种成长模式各有其产生的文学与文化语境，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将对读活动精准定位为“理解差异”与“对话互补”的文化学习。

其次，视角和风格改写迁移属于开放性任务，如果缺乏清晰的评价维度，学生的作品可能偏离教学目标，教师也难以给予有效反馈。因此，在布置改写任务之前，教师应与学生共同制定评价量表。视角改写的评价维度可包括新视角的心理活动是否真实可感、是否呈现了细节发现、语言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等；风格迁移创造则可侧重于是否准确识别并再现目标风格的核心特征，同时兼顾情节连贯与语言流畅。并将以上量表在点评环节对照使用，使评价过程透明化、可操作。

4. 结论

中西儿童成长小说是两种文化关于“成长”这一永恒命题的具体描绘。这两种叙事并非对立，而是人类理解成长的不同思维——或唤起读者对社会规训与个体自由的思考，或让读者在诗意中体悟生命的厚度。对教育者而言，比较的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到：成长的形态是多元的，每一种叙事传统都为“如何长大”提供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资源。只有将叙事差异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思辨、可内化的文化素养，文学阅读才能实现从“读故事”到“读世界”、从“理解他人”到“建构自我”的跃迁。

基金项目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省级)“从叙事到育人：中西儿童文学成长叙事比较与教育转化研究”(项目编号：S202611079092)。

参考文献

- [1] 尹静. 悲悯与崇高——论《草房子》的苦难叙事[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5(3): 74-77.
- [2] 王晓娱. “单一神话”视域下《草房子》中的叙事模式探析[J]. 中原文学, 2025(1): 59-61.
- [3]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32-38.
- [5] Turner, V., Abrahams, R. and Harris, A.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Routledge.